

黄金三十万丛书

特别提款权

钟道新 著



特别提款权

钟道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1/4 插页 2 字数 280,000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06-2254-4/I·2006

定价:15.80元

楔入繁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

李子干

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学总体成就的主要标志是什么？是长篇小说，是长篇小说繁荣发展的水平、力度、品格和规模。

这几乎已是中外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和唯一标准。至少，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的拉美某些国家是这样，我们的国家，当然也不例外。

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被誉为“感应时代神经”的新诗一度崛起，长期孤漠惨淡的散文也迎来了欣荣的春天，以伤痕、反思鸣锣开道的中短篇特别是中篇小说，更是春风得意，独领风骚十余年。唯独长篇小说，始终缺乏应有的生机，始终未能以黄钟大吕般的雄劲音喉，使疲软的文坛壮丽辉煌。

近年来，虽然出现了风靡喧嚣的长篇小说热，每年有几百乃至上千部长篇小说见诸于世；其中，虽然也不乏在对某些题材和人生人性的开掘上，在审美意旨的创求上，显示出一定成就的作品，但由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和把握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生活视野与精神境界开而不阔、浮而不深，以致难以制作出立足于时代制高点上的大气之作。

回望新时期十几年来，我国文学艺术所走过的轨迹，不难看出，一种文学潮流的兴起，哪怕是一种形式的更迭，固然有其自身规律的驱导，但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着时代心脉起伏的制约。

改革开放之光普照神州大地已近二十个春秋。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观念形态的急速变化、丰富多采的社会现实，璀璨明天的美好憧憬，已经向作家、艺术家，发出了描绘时代长卷的呼唤，提供了酿造宏篇巨作的肥壤沃土。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一切技艺精良，储备丰厚，才思敏捷，慧眼独具，并有志于为祖国文学大业高屋建瓴的弄潮儿，都应该披肝沥胆地挥长毫蘸浓墨，写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惊世之作，实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殷切期望，满足广大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一套以“黄金”为标志的长篇小说丛书应运而生。这套丛书，之所以以“黄金”命名，即非哗众取宠赶时髦，又非攀缘“硬通”搞炒卖，而是出自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这套丛书产生于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一齐“抓长篇、繁荣长篇的‘黄金时间’”；

其二，这套丛书要求开掘的是，以状写当代市场经济大潮中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为主旋律的“黄金题材”为主；

其三，这套丛书以每部 30 万字的规模成书，虽不敢言字字珠玑，但一定是优质精品，字字句句都需具有较高比重的“含金量”。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编辑思想是严肃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即在高品位艺术水准的追求中，强调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和脍炙众口的可读性。

如果说，长篇与中短篇小说的不同点，在于篇需要凝重思想的贯穿，巨大能量的聚散，和哲理意韵的升华的话，那么，这套将陆续出版的长篇小说丛书，就正是具有这种含蕴的“黄金”制品。

愿黄金 30 万篇小说丛书，将不辱黄金的盛名，与作为市场经济一大支柱的纯正黄金一样坚挺。

1996 年 1 月 30 日

黄金三十万丛书

HUANGJIN



BAIHUAWENYICHUBANSHE

目 录

楔入繁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 李予干(1)

第一章 (1)

第二章 (31)

第三章 (56)

第四章 (94)

第五章 (115)

第六章 (141)

第七章 (164)

第八章 (186)

 九章 (209)

 十章 (235)

第十一章 (262)

第十二章 (280)

第十三章 (301)

第十四章 (328)

第十五章 (345)

尾 声 (362)

后 记 (366)

第 一 章

方若石就像储备已尽、后援又断的极地探险者一样，调动身体中仅存的体能，向家的方向艰难地跋涉着。

街道两边尽是灯火辉煌的商店和宾馆。但它们对他根本没有吸引力：商店并不吸引人，它吸引的是人口袋里的钱；当你的兜里没钱时，就像磁场失去了一个极一样，引力就荡然无存了。走着走着，他觉得累了，就在一幢没人进出的大厦门前的台阶上顺势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梅”香烟，拆封抽出一支点燃。

就是你小子，害得我起码走了三公里。他狠狠地吸了一大口，并把它咽下去憋着，直到丹田有了反应，才把黄浊的烟雾喷射出去。刚才他在小卖部里，用最后的两块二毛钱中的一块七，买了这包烟。剩下的五毛钱准备用来买车票：个人经济和国家经济不一样，它不遵循凯恩斯理论，绝对不能出现赤字，你必须随时准备支付现金。可谁又能知道地铁的票恰恰从今天起，上升到了一块钱。于是只好重新爬到地面上来，步行回家。

烟抽到一半时，一个穿着和法国将军一样的警卫走了过来，用警惕的眼光扫了他一眼，然后迈着有力的步伐踱了回去。不一会儿，又踱了过来。

方若石仿佛听到他身上的各种零碎装饰和两个睾丸在一起互相撞击的声音。身体语言在某些时候比口语要有力得多。对于敏

感而有文化的人更是如此。他站起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几步又站住，很想把烟头扔进门口的石头狮子大张的嘴巴。但终究没能完成。

如果在二十年前，我就一定会这样做！如果有人来干涉的话，方若石回头看看又站回“海外银行”锃亮的铜牌下的忠诚卫士，那他就一定会和狮子一样地张大嘴巴，不同的是嘴里的牙齿会少掉两颗。但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和任何人、任何事物争斗的兴趣：二十年的时间什么磨不去？！

他所谓的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八年。那年他刚十八岁，正把口琴、《外国民歌二百首》和一些旧衣服胡乱塞进一个柳条箱和一个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字样的旅行包，准备启程去陕西插队。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个长满络腮胡须的派出所片警，把属于他的那页户口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一瞬间时自己那股高兴劲儿：从此“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再也不用受在大学里当教授的父亲和在医院当大夫的母亲的监督和指导了——有这两种职业的人，管制起人来真叫无微不至。

可到了那个只能老毛驴单骑行走，方能抵达的小村庄后，没用了一个礼拜，他就明白了“没人管”的滋味。与此同时，他萌发了回北京的念头。

菲律宾的马科斯、伊朗的巴列维在顷刻之间失去他们的王朝，可他们花费了毕生的精力都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二十年来，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好像在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复辟工程”——起初动因是理想，后来纯粹是惯性。

要疏通的关节实在是太多了：陕西的工作单位、北京的街道办事处、公安局、人事局……每个地方都需要润滑——润滑是什么意思？不说人们也明白。

他艰难地挣扎了很久之后，终于得到一个“你只要找到单位，

其余的就可以办”的允诺。

（黄燕青旁白）

找单位是比找媳妇还困难十倍的事：你找媳妇，媳妇也在找丈夫——虽然这个丈夫不一定是你。但你起码可以这样认为：所有在你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是你潜在的对象。而目前的单位是谁也不想要。我国的人口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当你没有好文笔、硬靠山时，越发如此。

（黄燕青旁白）

“为天有眼兮，何处我天南海北头，为神有灵兮，何咽我越荒洲。”一次酒后，他大颂此诗，并摔杯准备就此罢手。“千里跋涉都过来了，就剩这一跳了。”大病初愈的妻子邱圆用“鲤鱼跳龙门”的寓言压迫他。“北京比俺们县好多了。”已经追随他在北京寄居一年的孩子做如是说。

（黄燕青旁白）

虽说童言无忌，但这“俺们”一词深深地刺痛了他：普通话说不好，实际上是一种残疾。再说上了贼船就下不来，如果下的话，他面前立刻浮现出县立中学同事们带有深刻讥笑和虚伪同情的面孔……所有这些因素组合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黄燕青旁白）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一个月前，他先找到了一个允许他暂时存放工作关系的单位，然后靠着这根稻草，让户口复了位。

户口一到位，原来单位的工资立刻就没有了。存折上的数字很快就和国家的财政同步，开始“红”了起来。

“你去找找以前的同学试试。”邱圆提示道。

“你能想到的方法，我早就想到了。你以为求人就这么容易？！”他立刻反击。他少时就读的学校，是北京一等的好学校。这里的学生如果不是父母亲的级别顶高的话，就是学习成绩顶好。所以哪怕就是在此上过一天学的人，都引以为骄傲。就在去年，该学校出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国家的未来》。当时还有一本《校友通讯录》和一封约稿信，寄到他父亲任教过的Y大学，然后又从那里，辗转到了陕西。

他当然没有写稿，也没有回信。世界上所有的外交，说到底都是实力外交：没实力哪来的外交？你总不能在上面写：方若石，男，四十岁，外省某县立中学教员。

不过他仍然买了一本《国家的未来》。

他正想着，一辆足有七八米长的美国车，从他身边慢慢开过。车里溢出一股古巴雪茄、法国香水和高级皮革的混合味道。然后从车上飞出一个女式“摩尔”烟头。

方若石望着那烟头，做出了决定：明天丢弃脸面，去找自己的老同学。

当这个决定做出之后，他觉得自己甚至不如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幸运。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毕竟没有责任，而他有。

正当方若石像田埂上坐着的老农一样坐在“海外银行”的台阶上休息时，一辆“奔驰”车正沿着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公路盘旋行驶。车上坐着的是国际商业银行远东分部经理马克·波斯特。

国际商业银行创建于一九七二年。开始时它只有一千万美元的资本，而如今它已经是拥有二百多亿美元资本的全球性银行集团了。

马克·波斯特一九四一年出生于德国。一九六一年慕尼黑商学院肄业。他先是在一家中等的公司干低级职员，因为精明强干，很快就被提升。但后来因为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使得他离开了这家公司，到一个美资石油企业供职。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闹得最厉害时，他进入了国际商业银行。

在国际商业银行里，他很得总裁哈桑·阿贝迪的赏识，被飞快地提升起来。哈桑·阿贝迪是一个巴基斯坦银行家。是什叶穆斯林派。他浓眉大眼，高鼻阔嘴，爱戴宽边眼镜，双目炯炯有神，

令人一望即知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欲望非常强烈的人。他一直以自己有力的铁腕统治着这个金融帝国，使其蓬蓬勃勃地发展到今天。

此刻马克·波斯特正行进在向他汇报的途中。

国际商业银行是在卢森堡注册的，但它的总部却在瑞士。银行的注册和远洋货轮的注册一样，哪里方便就往哪里去。它之所以选择卢森堡，是因为这里的法律比较宽松，税收低，金融管理的机构小、人手少，对外国银行业务疏于监督，漏洞较多。

马克·波斯特在车上也没有闲着：袖珍的传真机，不停地输送出各种信息。他接收它们并作出反馈。

如今一笔典型的电子交易所需要的时间仅仅是三十秒到四十秒之间。它的风险主要来自骗取授权、数据线路的干扰、人员的不忠诚和物理渗透。电子货币不光在形势上超越了旧货币，还带动了革命：窖藏现金不仅是可笑的还是愚蠢的。钱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该高速流动的东西。

马克·波斯特面对大量涌出的信息，一点不给人以应接不暇之感。或者换句话说，他很喜欢这种信息的泛滥。他认为信息泛滥和通货膨胀是一种东西，如果你能很好地了解它，就能掌握它、驾驭它，并从中获得好处。

车停在一幢外表不很壮观，但戒备森严的别墅前。马克·波斯特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

车顺利地通过大门后停了下来。哈桑·阿贝迪有一个规矩：任何人都必须在此下车，然后步行一公里的路程，到达中心房间。

马克·波斯特充满自信地在这段路上走着。他始终都相信哈桑·阿贝迪喜欢他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他之所以设计这一公里步行路，就是为了消灭一般寻求投资者、来汇报的下级职员의 自信和强烈的投机精神。他还相信哈桑·阿贝迪和他从根本上

说是一种人。[1]

彭小彭正从办公桌上往外掏

东西。东西很杂，有印刷精美的广告宣传品、财务文件、请帖、单据、从来没用过的笔记本。另外还有各种圆珠笔、打火机、抽了

一半的香烟。[2]

伍勤听话地把纸张都放进碎纸机里，然后把剩余的硬性东西收拾进一个大塑料袋子里。[3]

“如果你看见什么能用，就留下来自己用。”彭小彭认为自己有必要说一句。如果他不说的话，伍勤一定会把它们统统扔掉。

伍勤点点头，把东西背了起来。

“你就像基督山伯爵的哑巴仆人。”三个月前，彭小彭成了N国人。也就是说他买了本N国护照，可以自由出入境。此护照的编号是：N-17，意思是“归化N国人”。这种护照比PE-11要好，因为后者是“外国N国人”，也就是“编外N国人”的意思。

大约十年前，财政困难的N国政府向海外发行这两种护照。前者值一万美元，而后者只要三千美元。

彭小彭毫不犹豫地买了前者。如果你的手里有足够的钱，那就买最好的东西。

有了护照，彭小彭决定到外面去闯一闯。第一站就是香港：因为如果到欧美，他的语言不通不说，也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买卖看上去做的是钱，而实际上做的是关系。而香港除去一些他平时积累的商务关系外，在香港的中资机构中，他也有许多熟人，比较容易打开局面。至于局面打开了以后怎么办，他暂时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一是杀向东南亚，二是返回中国大陆。

如果是前者，我也义无反顾。因为在大陆上我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东西和人——在闪动这个念头时，早已和他分居的妻子根本就没能进入他的感觉系统——只是眼前这个人，他看着默默收拾东西的伍勤，多少还有些牵挂。

听见声音的伍勤，依然用宽阔的背对着彭小彭。他是个足有一米八的大个子，脸上有一道横行的伤痕。就是这道伤痕，使他变得相当内向，不愿意面对任何人。

“你看过《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吗？”彭小彭问。伍勤摇头。

“你倒是给我说句话啊！”伍勤追随彭小彭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而他自觉今天第一次产生和他谈话的念头。

“他是哪个公司的？”伍勤很费力地说。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不说话，他的说话功能就会退化。

“算了。算了。”彭小彭想起上次问他看没看过《红楼梦》，伍勤也是想了半天后问：是不是一盘带子？

“扔完东西，你叫瓶酒和几个小菜来。”

伍勤还是没行动。

彭小彭不耐烦地催他快点去。

“多少钱的？”伍勤闷声闷气地问。

“最好的酒、最好的菜，和最好的朋友喝。”彭小彭这才想起少发了一条命令：伍勤执行起命令来，和电脑很相似，如果你输错了一个字符，它就会认为指令非法。

“最好的酒是不是‘二锅头’？”伍勤问。

“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彭小彭挥挥手，“就来‘二锅头’好了。”他是一个不在乎钱的人。钱对他来说，只是权力的外化：有了钱你就可以购买你想买的东西、指挥你想指挥的人。也就是说：钱是一种应该赶快使用的东西。而即使是一瓶最普通的法国酒，其价格也等于一箱“二锅头”。可伍勤就是喝不惯

法国酒。一次他请伍勤喝“路易十三”，伍勤喝了几口后就不喝了。他问为什么？伍勤半天才说：“不好喝。”他立刻教训道：“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某次为了挽救濒临灭亡的交响乐，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讲演，他说：‘交响乐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种——如果你说不好，就证明你没文化的东西。’法国酒也同理可证。”说到这，他觉得这话有些超出伍勤的理解力，就改说大白话：“一种东西如果别人都说好，你就也一定要跟着说好。否则就说明你特别土。”他说过这话之后，伍勤果然在每次应酬喝法国酒时，再不说二话。但喝的样子看上去煞是痛苦。某次彭小彭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问：“你喝这东西是什么味道？”伍勤喃了好久，才寻找到一句形容词：“和感冒时喝的止咳糖浆一样。”彭小彭听完之后大笑，从此不再强迫他喝。

伍勤走后，彭小彭把里屋卧室的两个大枕头放在地上，与沙发垫子配合成符合人体曲线的模型，然后躺了上去。

他一九五一年出生在一个标准的军人家庭。其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学院的院长，军衔中将。中国军事院校的官员的级别都非常的高，因为这是培养干部的地方。而要想抓住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毛主席很早就英明地指出：路线确定了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彭父早在古田会议时期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又与刘伯承等一批中共高级将领一起，被派到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三十年代，他一直在红军和八路军内供职，战功卓著，由团而师而军。四十年代初，他作为我党的军事代表派驻前苏联。一九四三年他带领一批在前苏联学成毕业的飞行员取道新疆回国。

当时统治新疆的是军阀盛世才。盛这个人是老谋深算之徒，向以马列主义者自居，并著有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书。可这时他看到前苏联危机，蒋介石又大举进攻解放区，就

决定叛变。于是彭父就和毛泽民、林基路、陈潭秋等一百多人，一同被扣在新疆的监狱里了。狱中成立党小组，他们四个就是负责人。

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蒋开始把新疆“党化”。随着这个进程，盛世才把毛泽民、林基路、陈潭秋一个一个杀害了，等轮到彭父时，中央命令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情况下可以自首出狱，他也就出来了。

建国后，彭父先是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当武官，一九五八年回国后，一直在陆军学院任职。

文革开始没多久，由黄永胜签发逮捕令，他被抓入狱。这一抓就是十年。出来之后，这个几乎快把“牢底坐穿”的人，已是疾病缠身。临终前，彭小彭为了父亲那笔当时看来为数甚巨的补发的工资，和姐姐们大吵大闹——他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当然不是一个母亲——最后他把那不用上肥皂、热水就能刮胡子的伞兵刀都出动了。

彭父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序列在彭小彭之上、年龄范围广阔的子女们说：“你们不是有业，就是有家。我看把钱给了小彭吧。”

七十年代还是一个传统道德没有完全被取代的年代，老父的话虽然不能说一言九鼎，作用还是有的。彭小彭经过一些挫折，最终还是把钱拿到手。

他并不是如一般人印象中的花花公子：少时优良的教育、“文革”时由父亲的一个老朋友的荫护，没有和方若石他们一样，去农村插队，而是先参军——当然尽管“文革”派看上去法力无边，但军队还是相对独立的——再上航校。航校虽说只是一个中专，但毕竟是在上学、读书，和“种地”“做工”之流，不可同日而语。所有这些，再加上他们家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他的个人才能、智力和几万块钱的资本，就具备了先决条件。

他先把父亲的钱投在机电行业，然后又转向办公自动化。八十年代的冰箱、彩电热，中期的电脑热，一浪一浪，全都赶上了。很快就积聚了数百万元。当有人问他其中原因时，他总是说：“仅仅是凭借良好的感觉而已。”

“感觉”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罢了。他并没有把自己觉悟并严格遵循的商业铁律说出来：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是从零到最高值，然后又从最高值返回零。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以电脑为例：在北京有十家电脑公司时，一台电脑能有一万元的利。而当北京有一千家电脑公司时，每台电脑能得的利就只有几百元了，因为市场的总份额是一定的，也就是说：蛋糕只有那么大。所以应该在某些行业还在正半波时，就做转向准备，一旦它达到顶点，就立刻抽出资金投向新行业中去。他并没有上过任何的商业学校，更没有工商管理方面的学位。这是从惊人的商业直觉中提炼出来的朴素真理。有许多平庸的商人，不知道吃过多少回亏，仍然不能总结。

伍勤把“二锅头”酒和菜都拿了上来，然后进卫生间把客人用过的杯子洗干净。

“几度投资，几度经营。”彭小彭语义不清地在回忆往事：这是一个移动前的必然反映。

伍勤把一瓶酒分到两个杯子里，没有任何反应。

彭小彭把酒杯端起来。

伍勤也跟着端起来。

彭小彭一口干了。

伍勤也跟着了一口干了。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为什么去香港？和去香港以后是什么打算？”，彭小彭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尤其在喝酒时更是如此。

“您的事情我不懂。”伍勤老实地回答。

“你确实不懂。”彭小彭想起在年初被抓进检察院的老牛。

老牛不能算是他的朋友：在生意场上是没有朋友的，是朋友就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做生意。利益和友谊有着不同的单位：一头牛加上一辆汽车等于什么？他不过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伙伴而已。此人的买卖模样不小，场面也铺陈的相当豪华，然而他却有着一张秦城监狱一般的嘴巴。但某次酒后他还是说：“在中国只有两种人好做生意：一种是国家的代表，规规矩矩地做，自己只用不拿。另外就是有外国身份的人，从打有义和团起，外国人就比中国人吃香。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停了一会儿，老牛又哆嗦着说：“有时我好怕。”

他诧异地看着老牛：他怕的是什麼？此人虽无家庭背景，刚上商场时，确实是两眼一抹黑。但他敢使钱，也懂得使钱的人：一般人从银行里贷来二十万块钱，顶多拿出其中的一、二万块钱送人，而他却敢拿出十万。甚至十五万送人。因他用钱开道，两眼雪亮。到纺织部门、机电部门拿个批件，如同从自家的保险箱里往外取东西一样的方便。

“你们永远不会懂我的心态。我和那些当权的人，没有任何家庭、血缘方面的关系，我只是靠钱。所以在我有钱时，什么都说好。你也是个玩钱的人，还不知道钱是怎么回事？就像玩五个球的杂技演员，只要有一个球接不住，就会都玩完了。所以，赶紧趁有钱时，弄一个身份来。”老牛讲完纯理论，又以故事作例证：讲一个英国商人和一个法国商人和一个中国商人在一起侃什么是幸福。英国商人说：幸福就是你在一次艰苦的商务谈判后，真皮包里夹着一份签订的合同，在一个阴沉沉的傍晚回到家里，家里已有一套柔软的睡衣，一双在熊熊的壁炉旁烘热了的拖鞋和一个满脸笑容的妻子在期待着